

论“黑旋风”李逵

洛平 翟文

《水浒》一书，在极力美化投降派宋江，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同时，对反招安、反投降的革命派代表人物李逵，肆意加以歪曲和丑化，并以此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作者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李逵这个被《水浒》作者横加污蔑的革命派人物，揭露作者丑化革命的险恶用心和歪曲历史的卑劣手法，对于进一步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划清投降派和革命派的界限，划清“完美的苍蝇”和“有缺点的战士”的界限，提高政治上和文艺上的识别能力，坚持革命原则，明辨路线是非，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黑旋风”李逵，从现实舞台搬上文艺舞台，首先出现在民间艺人的创作中。据南宋龚圣与的记载，早在南宋，李逵作为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就见于当时的“街谈巷语”了，以后又以多种文艺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元明杂剧中，关于李逵的现存剧目就有十四种之多，其他许多有关梁山故事的剧本也少不了李逵这个人物。任何文艺形象都是一定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北宋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运动中，涌现出了无数农民革命英雄。他们对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怀着烈火般的仇恨，在反封建斗争中勇往直前；他们被封建统治者咒骂为“凶焰”、“狂寇”，而民间艺人却以自己的艺术真实多少反映了这些活在广大人民心里的英雄群象。“性如烈火，直似弓弦”的李逵，正是经过民间艺人的艺术概括所塑造出来的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面对这一事实，尽管《水浒》作者把革命先锋李逵作为“痞子”、斥为“黑厮”，进行歪曲和污蔑，但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又不能不把反招安、反投降的李逵作为对立面而保留他的某些特点。李逵的出现，和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出现一样，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真、善、美与假、恶、丑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只不过对立的阶级具有相

反的评判标准罢了。哪里有反革命的白骨精，哪里就有革命的黑旋风，李逵这个农民运动中革命先锋的形象，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掩埋不了的。

李逵出身于一个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家庭，哥哥“专与人家做长工”，连老母也养不活，李逵从小养成了倔强的反抗性格，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铁牛”、“山儿”。长大了，被迫只身流落在外，老母日夜思念，把双眼哭瞎了。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逼得他无路可走，封建专制的重重压迫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在李逵身上，我们可以说“积累了农民群众由于几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压迫，官僚的横暴和劫掠，以及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而发出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然而，满腔的怒火一下又找不到喷火口。李逵，这个农民阶级用反抗精神哺育成长的“本能的革命者”，多么渴望一场斗争的暴风雨啊！

斗争的序幕终于揭开了！当宋江误题“反诗”被绑赴江州法场时，李逵配合着不期而至的各路好汉，手执双斧，声喝如雷，劈翻刽子手，砍向监斩官，用自己同阶级敌人血战的实际行动，加入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行列，表现了革命阶级最大的“历史主动性”。

列宁指出：“农民有更加直觉的革命性，他们急切地想立刻打垮地主政权，立刻创立新制度。农民心中的怒火在燃烧，恨不得马上扑到敌人身上，把敌人扼死。”李逵正是这样具有“直觉的革命性”的农民的代表。当他一踏上梁山的土地，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决不是“不省得道理”的胡言乱语，这是封建社会里反封建最彻底的贫苦农民心灵深处的革命呼声，这也是李逵一贯坚持的政治纲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就是夺权。对于李逵及其代表的广大梁山农民起义军将士来说，聚义造反，就是要同以徽宗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作个对头”，并通过武装斗争，杀去东京，夺取政权。敢不敢反皇帝，要不要夺取地主阶级的政权，是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宋江“修正”晁盖路线，叛卖农民革命，其要害就在投降，不反皇帝，乞求招安；而李逵是好的，不愿投降，反对招安，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宋江的对立面，代表着梁山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尽管《水浒》作者用尽抹煞阶级界限的手法，把李、宋二人安排为“情分最重”的患难知交，一同上山的“结义兄弟”，但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及其反映在起义军内部的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李逵从江州酒楼结识宋江起，就产生过真假“义士哥哥”的怀疑；以后对宋江这个阶级异己分子的阴谋活动，也始终具有一种自发的革命警觉。

当各路好汉江州劫法场以后，应该说，唯一的出路是聚义梁山，然而宋江却公然提出了“愿不愿意上梁山”的问题，实际流露出他对梁山革命道路怀着二心，李逵自发地警觉到这个问题提得十分荒谬，立即大叫：“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这是简单粗暴么？不，这是坚定的革命派对宋江散布的怀疑情绪的有力回击！

当宋江从千里之外把卢俊义请上山来，并要让他坐第一把交椅时，李逵又本能地警觉到，这不是宋江什么“谦虚礼让”，而是要把农民军领导权拱手送给反动大地主，他立即表态：“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杀将起来！”

当宋江“把寨为头”后，李逵从宋江的所作所为中，实际感觉到了梁山泊在演变，“水不甜，人不义”，进一步怀疑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他尖锐指出：宋江“原正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实质上是点出了宋江假造反、真投降的丑恶面貌；“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实质上是揭露了宋江在组织上招揽同类、结党营私。当李逵愤怒地拔出大斧，砍倒“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并径奔宋江，准备除掉这个“狗肺狼心”的野心家时，尽管《水浒》作者故意编造一段冒名顶替的情节，强使李逵去向宋江“负荆请罪”，并让宋江“金蝉脱壳”，逃避了这次审查，但怎么也掩盖不了李逵对宋江拉拢反动军官、走李师师后门、搞肮脏政治交易等丑恶行径的极端愤慨。作者主观上希图这样用李逵的“莽撞”来反衬宋江的“精明”，却正好表露了李逵凭着他的革命直觉已多少看出了宋江“指天画地能瞒鬼”，在路线上存在着严重问题。

李逵对宋江的投降路线，不仅有着自发的警觉，而且表现出在路线问题上不跟“哥哥”的指挥棒转，坚持了原则斗争。

李逵不仅一而再，再而三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正确路线来与宋江投降路线相对抗；并且当宋江用“对天盟誓”的鬼把戏来强化反革命纪律，在菊花会上发动突然袭击，公开抛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反动纲领时，李逵顿时睁圆怪眼，大声怒斥：“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翻，搯做粉碎。这种反招安的激烈行动，在农民革命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李逵的这一脚，正如唐末农民起义军内部斗争中黄巢对着准备接受招安的投降派头领王仙芝的头狠狠地猛击一拳一样，实际上代表着农民革命派在路线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代表着广大农民军将士要踢翻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革命意志。正因为如此，逼使宋江撕下“谦逊友爱”的面纱，露出了狰狞面目，要把李逵推出斩首。这是梁山上两条对立路线一次短兵相接的冲突。然而《水浒》作者按照他的主观设计，竟用宋江的几滴鳄鱼眼泪和李逵一反常态的“喏喏连声而退”，把斗争平息下来，并企图证明宋江对皇帝的一片“忠心”似乎把李逵的“反心”也战胜了。

实际上，斗争是不可能平息的。一方面宋江伙同卢俊义猖狂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与太尉宿元景、陈宗善以及妓女李师师等内外勾结，演出了一幕幕跪求招安、跪听宣诏的丑剧，下手绞杀梁山农民军。另一方面李逵、吴用、三阮等自相配合，坚决反抗。吴用对接受招安多次提出异议；阮小七等藐视皇权，倒换御酒，给陈宗善之流以无情戏弄；尤其是李逵，以“冲天”的革命义愤，“从梁上跳将下来，夺过诏书，扯的粉碎”，破口大骂宋徽宗，挥拳痛打陈宗善。尽管作者写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赞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虽经波折，仍然取得胜利，但却反证了在梁山上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大搏斗中，李逵的言行，代表了革命农民向整个

地主阶级宣战，是对封建王朝“招抚”阴谋的迎头痛击，是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公开否定！

李逵不愧是头上有角的“铁牛”，是冲决封建网罗的革命旋风！他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实际觉悟、高贵品质和拼命精神，充分说明他正是梁山上眼最亮，心最明的革命先锋，决不是《水浒》作者所污蔑的“痞子”、“黑厮”、“黑禽兽”，也决不是某些《水浒》评论者所说的“眼不亮”，“心不明”的“糊涂人”。

如果说《水浒》作者在前七十多回中为了反衬宋江投降路线的“合理”发展，不得不设置矛盾，保留李逵某些反招安、反投降的言行，因而也就不得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顽强的历史事实来揭穿自己的曲笔；那么，在后二十多回中，作者为了纵情歌颂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全面胜利和宋江一伙投降派“功成果满”的完美结局，就只能有意违反历史真实和李逵的一贯性格，主观臆造了李逵也跟着宋江去接受了招安，还去充当了打方腊的刽子手。尽管如此向壁虚构，作者自己也理亏心虚，明知李逵这样的农民革命派的“反心”是除不了的，所以他对李逵还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以至不得不最后让宋江用御赐药酒将他毒死。这是封建奴才的丑恶灵魂和反动幻想的自我暴露，暴露了他们对革命农民的万分恐惧和仇恨。

按照《水浒》作者的如意算盘，李逵反招安的斗争失败了，梁山农民起义军被剿灭了，而且一箭四雕，连方腊、王庆、田虎也通通平定了。其实，这不过是地主阶级的痴心妄想。就在作者歪曲描写的梁山起义军被血腥镇压之后，不到八年，洞庭湖畔，太行山上，到处又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李逵式的农民革命派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二

毛主席教导说：“除非是反动的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他们“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水浒》的作者正是这样的反动文艺家，他们为了给文艺舞台和现实舞台上的宋江之流打气撑腰，为了给现实中和他们心目中的李逵们涂污抹黑，把投降派宋江写成“神圣”，把革命派李逵有意写成“暴徒”，不仅“暴”，而且“天生愚蠢”，终于被宋江所奴化、所征服、所毒死，妄图用这样墨写的谎言来掩盖血写的事实。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说，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历史上无数农民英雄用自己的鲜血写出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部历史记录着叛徒的罪恶、屠夫的凶残和革命烈士的鲜血所凝成的劳动人民的光荣传统，是任何谎言也掩盖不了的。

让我们剖视一下《水浒》的作者是怎样用谎言来掩盖历史真实，是怎样对李逵

这个农民革命派的形象进行歪曲和污蔑的。

首先，作者有意歪曲农民起义的原因，把李逵等农民革命派的反抗活动污蔑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作者通过戴宗之口向读者介绍，李逵之所以走投无路，逼上梁山，是因为生性“凶顽”，“打死了人”，逃到江州，又爱“赌博”，爱“酗酒”，爱“杀人”。同时还污蔑阮氏三兄弟之所以参加革命也是因为“赌博输了钱，无处安身”。总之一句话，在作者看来，李逵和他的战友们是一些“赌棍”、“酒鬼”、“亡命之徒”。事实难道真是这样吗？这是恶意的丑化，无耻的污蔑。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宋代，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者，采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一小撮皇室、贵族、官僚大地主所抢占，而丧失土地的贫苦农民（客户），却占了全国户数的三分之二。剥削极端残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所谓“古者刻削之法，本朝俱备”。政和元年，宋徽宗赵佶又指使杨戩建立“城西括田所”，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先从河南汝州括起，括夺民田三万四千多顷，后来李彦接替杨戩，括得更为厉害，包括梁山周围八百余亩湖泊也一齐括为“公田”，群众下湖采莲捕鱼都要缴租，断绝了周围农民的生路。梁山农民被逼得“咬牙切齿，售儿卖女”。正是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压榨，激起了广大农民起来造反。《水浒》作者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目的在抹煞阶级斗争，掩盖地主阶级的罪恶，并血口喷人，恶毒污蔑革命造反的贫苦农民是“亡命之徒”，是“杀人犯”，是“痞子”！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身所希望的事实。”《水浒》作者自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奴才，以贩卖奴才哲学为天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们总是希望革命的人民统统变成俯首贴耳的奴才。《水浒》一书为了刻画宋江善于驯服造反的奴隶，前半部不得不把李逵的反抗性格烘托几句。但作者基于总的创作目的，对李逵的反抗性格也尽力加以丑化和歪曲，希望李逵变成一个可笑、可欺、可以任人愚弄的“莽汉”。于是，宋江用“仗义疏财”的十两银子可以骗得李逵的信任；阴阳怪气的罗真人又可以把李逵骗到空中，摔到蓟州，淋上一身狗血人粪，愚弄一通之后，又让李逵磕头求饶。作者以这样的描写来满足地主阶级的奴役狂。之后，每当李逵坚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路线，宋江斥为“胡说”，“再犯必不轻恕”时，《水浒》的作者硬要李逵忍辱退让；当李逵在菊花会上痛斥“招安”，戳到了宋江的要害因而被宋江横蛮无理地要绑出斩首时，作者强使李逵毫不反抗，并说出“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的违心话。如此等等，作者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和自己的奴才心理来改装李逵，企图证明宋江的投降路线可以靠孔孟之道的“忠义”绳索把革命派的手脚捆住而取得节节胜利。至于后二十多回，作者更施展了“挖心”战术，把李逵的反抗性格彻底挖掉，换上作者所伪造的“生时伏侍哥哥，死后也只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的奴才性格。于是，坚决反招安的李逵可以被宋江牵着鼻子去接受招安，

去征方腊，去当鸟官，去喝毒酒；最后，除了无可奈何地叫一声“哥哥反了罢”以外，竟乖乖地回到润州去坐等“药发身死”。这一异想天开的伪造，是对李逵形象的最严重的歪曲，是作者把自己的奴颜媚骨强加在革命人民身上，是对一切革命派的公开侮辱。这就是列宁所揭露的“无耻之徒”所干的勾当，即“不是把奴隶变成革命家，而是把奴隶变成奴才”。然而《水浒》的某些研究者，竟从这里感到一种特殊的满足，尽情赞美李逵“服从宋江，忠于宋江”的“高贵品质”是什么“最浑然地体现出中国劳动人民的纯朴、坦直和公正”。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种生活。”《水浒》作者的意图正是如此，所以伪造了李逵“忠于宋江”而跟着投降，乃至被宋江毒死也心甘情愿等情节，用以表明宋江如何善于驯服和镇压敢于造反的奴隶，用以表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具有征服一切人心的魔力。奇怪的是某些研究者，竟欣然同意这种伪造，并从作者强加于李逵身上的奴性中“寻出‘美’来”，加以赞叹。这只能说明他们千方百计地要舞台上和现实中的李逵们都除去“反心”，变成奴才，都去“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善的好心主人感激不尽”。一句话，就是要极力丑化和奴化革命人民。

攻击革命暴力，把革命派咒骂为杀人不眨眼的“魔君”、“杀星”，这是《水浒》作者歪曲李逵形象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作者通过罗真人之口，胡说李逵是什么“上界地杀星之数，为的是下土众生作孽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因此，每当李逵出现，作者总是安排他抡起板斧，乱杀乱砍，什么“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什么“杀得顺手”，“杀得快活”，有意把李逵写成“嗜血成性”的“暴徒”。这是对起义农民的恶毒污蔑和攻击，这是借攻击暴力来攻击革命，借攻击革命的暴力来辩护反革命的暴力。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依靠反革命暴力来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血腥统治。在宋代，一小撮官僚大地主的疯狂兼并和残酷剥削，使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挣扎在死亡线上；封建朝廷豢养了一百多万反动军队，专门用来镇压农民起义，对农民起义的大规模屠杀，就连封建史家也供认不讳。正是反抗这种反革命的暴力统治，革命农民才“啸聚山林”，开展武装斗争，愈来愈认识到只有依靠革命暴力才能打翻剥削者，解放穷苦人。《水浒》作者所面对的元末红巾军提出的“杀尽不平方太平”的革命真理，正是从李逵为代表的革命农民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然而，《水浒》作者一方面放肆地污蔑革命农民，攻击革命暴力，反对暴力革命；同时又以疯狂的热情来赞扬反革命暴力，赞扬反革命暴力对方腊等农民起义军所实行的血腥镇压，充分暴露了作者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立场。

在攻击革命暴力的同时，作者还竭力散布对革命的悲观主义。《水浒》把接受招安作为农民起义的归宿，极力宣扬革命无理，投降有功；作者并未就此止步，他又进一步把事情的局面故意描写得凄凄惨惨戚戚，李逵这样的革命英雄，也是一杯毒酒，三个“罢”字，了此一生，别无出路，到头来“魂聚蓼儿洼”，一片“落花啼鸟总关愁”的悲凉景色。那个腰斩《水浒》的反动文人金圣叹，更是昏庸而又可恶，他

砍掉了后二十多回，却设想了一场“噩梦”，让梁山农民起义军在一夜之间全部被嵇叔夜斩尽杀绝了事。两种手法，一个用心，都在宣扬革命没有前途。这是地主阶级极端恶毒的一手，妄图用反动没落的历史宿命论和悲观主义来毒害人民，瓦解革命，并从根本上否定农民革命风雷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真正动力，否定农民革命英雄改天换地的历史功勋。

《水浒》一书对农民革命历史的有意歪曲，对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英雄的百般丑化，其实质是用地主阶级的反动意识来偷换起义农民的革命性格，用地主阶级的反动幻想来安排农民革命的所谓历史结局，目的在美化宋江及一切投降派，歌颂投降主义路线，污蔑李逵及一切革命派，抹煞农民的革命路线，否定劳动人民的革命传统，幻想腐朽的封建制度永世长存。

三

《水浒》一书所表白的地主阶级的反动幻想，早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彻底破灭了。但长期以来，在《水浒》的研究中，却有人一方面赞赏作者对宋江的美化，进一步把宋江这个十足的封建奴才，说成是“农民起义最适当的领袖”；把宋江适应地主阶级策略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农民革命“唯一无二的道路”，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又信服作者对李逵的污蔑，把《水浒》歪曲历史真实，强加于李逵身上的肮脏东西，也统统说成是“农民的性格”；连作者臆造的李逵也跟着宋江去向封建统治阶级屈膝投降，也说成是“概括了农民革命的本质规律”，是不可避免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甚至认为，如果梁山农民军让李逵去领导，会失败得更惨……。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都在所谓“农民的局限性”上做文章。通过所谓“农民的局限性”问题，把李逵和宋江、英雄和奴才、战士和苍蝇合二而一，把农民起义中两条对立的路线——宁死不屈、坚持斗争的革命路线和蝇营狗苟、乞求招安的投降路线混为一谈。这里玩弄的是一种障眼法，把专门歌颂投降派宋江的《水浒》，吹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却把历史上千百次农民起义中反招安、反投降、奋战到底、视死如归的无数革命英雄撇在一边，从而掩盖了农民革命的真正史诗，抹煞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传统。这更是一种栽赃法，把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的反动本性诬指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把宋江之流的奴性也硬栽到李逵身上，借以达到丑化革命农民的目的。这种与《水浒》作者同声相应的谬论，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革命的历史，抹煞了反封建斗争中广大农民的革命性，是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是有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的。主要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只能提出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要求建立一个“等贵贱，均贫富”，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太平”世界。李逵要用板斧“砍尽鸟官”，“杀去东京”，夺取全国政权，正是要把他所向

往的经济上“劫富济贫”，政治上“不分贵贱”，使李逵的老娘和哥哥都“一发去快活”的理想生活推广到全国。这种基于小农经济地位所提出的社会理想，虽然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愿望，反映了“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但它“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即是说，它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农民革命的结果，即使推翻了一个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却并不能建立一个农民所想象的平均主义的社会。这就是农民阶级的根本局限。与此相联系，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着农民的眼界。他们作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使他们仇恨剥削者，仇恨剥削制度，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某种朴素的敌我观念和阶级意识，自发地坚持着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李逵这个革命农民的典型，他以满腔怒火，冲杀在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从江州法场杀起，一直杀到宋徽宗的梦中，对准皇帝抡起他报仇的双斧。他基于对梁山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宋江一伙的篡权阴谋和投降诡计，进行了反复斗争。但是，农民革命派还不可能具有明确的科学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不可能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起义军内部复杂尖锐的路线斗争，因而在地主阶级施展各种阴谋手段，打进来，拉出去，动用全部封建上层建筑的绳索作用和腐蚀影响的特定情况下，李逵及其战友们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被宋江所鼓吹的反动“忠义”说教所蒙骗，不善于辨别那些伪装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以致被伪装成“义士哥哥”的内奸篡夺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而未能战而胜之，取而代之。李逵身上所体现的农民局限性，不过如此。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梁山农民革命事业虽然被宋江断送了，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派的“反心”是任何力量也扑不灭的。

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农民的这种局限性，只是表明在无产阶级出现之前的农民革命，虽然打击了封建统治，推翻了一个个腐朽王朝，但最后总陷于失败，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提出的革命理想不可能实现，农民建立的革命政权不可能巩固；而决不是说农民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农民具有什么“妥协、投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类的局限性。失败决不等于投降。相反的，每次农民革命在敌人镇压、内奸破坏之下失败了以后，正因为是在血泊中重新站起来的农民，对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决不妥协，决不投降，所以又以更加坚强的革命性掀起了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毛主席指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红旗卷起农奴戟”。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爆发了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革命的怒涛中，涌现了无数的李逵式的革命英雄。他们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局限性”，他们既反贪官，又反皇帝，并要推翻整个

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他们宣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坚信：“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他们敢于“冲天”，杀去长安“问罪”皇帝；他们抡起板斧，决心“杀尽不平”，把“昏君赃官杀个光”，杀出一个“人人得太平”，“大小都欢悦”的光明世界；他们以“敢于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多次运用革命暴力，夺了封建统治者的“鸟位”，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行了猛烈的冲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在革命过程中，不仅藐视封建统治者的军事围剿，还粉碎了封建统治者的“招抚”、“诱降”的阴谋，严惩内奸叛徒，坚持斗争，反对投降，横眉冷对敌人的屠刀；宁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他们用自己的斗争，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从大泽乡“揭竿而起”就飘扬着的那一面战斗的旗帜，写出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农民革命的壮丽史诗，形成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凝成了我们民族的光荣革命传统。活在人民心里、保留在民间艺人创作中的“黑旋风”李逵，劳动阶级赋予他以“性如烈火，直似弓弦”的革命品质，反封建革命斗争培育了他“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天也不怕”的反抗精神。他的两只板斧，一腔热血，是梁山农民起义军的灵魂，也正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光荣革命传统。

梁山农民起义虽然被宋江这个可耻的投降派断送了，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经过顽强斗争而暂时失败了。但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因而，李逵和无数农民革命英雄反压迫、反剥削、反招安、反投降，同阶级敌人血战到底，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不会死去。它曾经鼓舞着我国广大贫苦农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斗争，失败，再斗争，终于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头上的“三座大山”，砸碎了身上的“四条绳索”，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伟大胜利。它仍然在激励着我们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粉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为扫除一切害人虫而勇往直前，奋战到底！

征

收

明

年

订

户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系面向工农兵的政治理论刊物和自然科学方面综合性的理论与应用技术刊物，现全国各地邮局正在办理一九七六年订阅手续，请读者到当地邮局订阅。编辑部不办订阅手续。哲学社会科学版系双月刊，单月出版，每册定价 0.25 元，全年共 1.50 元；自然科学版系季刊，季中月出版，每册定价 0.53 元，全年共 2.12 元。